

#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道路与区域交流

颜 信

【摘要】道路是地区经贸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重要前提,经贸文化因道路而繁荣。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道路就已经形成,它们成为中国西南各地间经贸交流的纽带,同时也成为促进中国西南各地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考古材料的梳理,考订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道路的基本情况,揭示中国西南道路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先秦两汉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经贸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92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5)1-0155-6

交通道路是区域间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提,区域经济文化因道路的开通而繁荣。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两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间就有众多条道路将各地相互通连。笔者在文中将着重以先秦两汉时期西南道路概况及道路沿线各地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为据,分析研究中国西南道路在为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 一、中国西南道路概述

先秦两汉时期,四川、云南、贵州间存在着多条道路,这些道路将这一区域中的各地相互通联,正因如此,各地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也越发频繁,沟通各地的道路正是我们所知开通于先秦两汉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即为沟通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道路,同时此道路也是与境外缅甸、印度等多地进行贸易交流的重要通道,四川成都正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云南、贵州多地则是这段道路中的重

要节点。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即从四川成都出发向南而延伸,并分为东、西两段最终在云南大理地区合道为一路再通向外域地区,这一段我们将其界定为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文中将对南方丝绸之路东、西两段道路的情况加以概述。

### (一)南方丝绸之路东段

南方丝绸之路东段是川、滇、黔之间最早的道路,这一段道路分别由岷江道、五尺道、牂牁道等多条道路构成。其中四川境内由岷江道、五尺道两段,云南境内则主要是五尺道,贵州境内则有五尺道和牂牁道。

岷江道以南方丝绸之路的成都为起点,沿岷江向南入乐山过犍为到宜宾。据考证,此段道路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道路开凿是由李冰烧崖修筑而成,整条古道均依崖而建,一路都较为的险峻。岷江道中的宜宾一段因汉代宜宾属犍道县所辖,所以这一段也被称为犍道。

东段道路中沟通川滇黔间的道路为五尺道,该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五尺道——牂牁道调查与研究”(编号SC12E038)的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颜 信,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68。

段道路则与岷江道相连,有关五尺道的相关文献记载可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考证,书载:“秦时常頔,略通五尺道。”<sup>(1)</sup>这段道路的得名是因此栈道宽五尺因此故名五尺道。有关五尺道的走向,诸学者都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近人向达先生在其《蛮书校注》中考订指出,五尺道起自今川内宜宾,经高县、珙县、筠连等地,入云南昭通境内的盐津、大关、彝良、昭阳区等地,再折入贵州威宁南下入宣威,经宣威达曲靖接昆明,全长两千多里<sup>(2)</sup>。段渝教授指出五尺道走向为从古代成都南下安南(今四川乐山),经夔道(今四川宜宾)、夜郎西境(今贵州威宁、云南昭通),直通南中之建宁(今云南曲靖)<sup>(3)</sup>。有关五尺道的走向大部分学者认识都较为一致,并无太多的异议。

五尺道的开通年代无论从沿线出土的各种器物还是从文献记载考订,这一条自古蜀国腹地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重要古代道路形成的时间应该至迟不会晚于商代晚期<sup>(4)</sup>。五尺道自形成以来,就已经成为川滇黔三地间进行经贸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特别是在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更是西南夷地区间使用最为频繁的道路,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南方丝绸之路东段道路中的另一段道路为牂牁道,该道路是川、滇、黔三地沟通楚、南越等地的交通道路。牂牁道西与五尺道相连,据考证,牂牁道与五尺道在贵州威宁相接,并与夜郎(今贵州安顺)、巴(今重庆)至楚地。在战国晚期蜀守张若、楚将庄蹻经略西南夷地区,这正是循着蜀、楚商人入滇的通道而来,这通道正是我们所指的牂牁道和五尺道两段道路,其中楚至夜郎这一段道路为牂牁道。在稍晚期的汉代,汉武帝为征服南越,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朝派唐蒙出使南越,欲令其归附汉统。唐蒙在南越之地品尝产自蜀郡的枸酱,了解枸酱贩运到此的路线,认为它是“制越一奇也”,于是向汉武帝提出通夜郎道,以夷制夷的计策。唐蒙受汉武帝之命,亲自率众自巴蜀符关(今四川泸州合江南)入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感召夜郎及旁小邑归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第二次进入夜郎,下牂牁江(今贵州北盘江),夜郎道才全线贯通。

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唐代牂牁道走向为云南昆明至曲靖至牂牁部族(今贵州威宁地区),又东渡入黔江(乌江)流域下行至贵州东北境,分为两道。其一仍循黔江下行,东北至重庆彭水达涪陵。此为牂牁各部族纳贡通使的主道。另一道为东行入沅江流域,下行至贵州中部经水路出贵州入南越之地<sup>(5)</sup>。该段道路由陆路和水路两段构成,其陆路经夜郎与川、滇相接,水路则顺牂牁江可沟通南越之地。

笔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东段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已经存在,其各段道路沟通了巴蜀、滇、夜郎等多地,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南方丝绸之路东段不仅仅沟通中国西南各地,同时也可向东经陆路和水路与南越、楚地等沟通。

## (二)南方丝绸之路西段

南方丝绸之路西段俗称为牻牛道,此道路途中之灵关天险,历朝历代均设守于此,因此又称其为灵关道(或零关道)。该道路走向应由古蜀王都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一路南下到汉代铁都临邛(今邛崃),再南到雅安、荃经(汉代严道县),翻越邛崃大山(今泥巴山)至雅安汉源(汉代牻牛道),过清溪峡至甘洛、越西,途经汉代灵关入安宁河流域各地至西昌(汉代越嶲郡)。从西昌出发到达会理县境内后,再沿河向西南下至拉解渡口,利用金沙江水路经攀枝花到云南省大姚县,西入大理地区的普淜驿与南方丝绸之路东段在此合路。

南方丝绸之路东、西两段在云南大理合道后,沿今滇缅公路,过云南驿至下关,从下关南下越巍山、永平,越博南山,渡澜沧江到达保山。再由保山翻高黎贡山到达乘象之国(今腾冲),再越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境内,或在腾冲循大盈江南下,经过千崖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其中南方丝绸之路下关以西至保山一段,因汉代保山为汉代永昌郡,曾与身毒直接相连,是汉经营西南的最前沿,因此这一段也被称为永昌道。而下关西行途径博南山一段又被称为博南道<sup>(6)</sup>。

从南方丝绸之路东、西两段的记述可见,无论是东段的五尺道、牂牁道还是西段的牻牛道,包括

其他各条支线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南地区沟通境内外各地的纽带。笔者认为,随着这些道路的开通,它们为中国早期西南地区各地间经贸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它们为沟通境内南越之地,境外的南亚、东南亚等地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 二、中国西南道路与区域经贸交流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间因道路的初步开通,各地间的经贸交流活动也越发频繁,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文献记载可知。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秦时常頔,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sup>[7]</sup>从该段文字可知秦时既然在当时的西南夷(靡莫、夜郎、滇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吏使,那么商贸往来就必然存在于这一地区。汉初,虽然“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但巴蜀地区的商贾依然和这些地区间保持着民间的贸易往来。《史记·货殖列传》中载曰:“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馆鞅其口,以所多易所鲜。”<sup>[8]</sup>《汉书·地理志》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笮马旄牛。”<sup>[9]</sup>从《史记》的记载可知当时巴蜀之地出铜、铁,《汉书·地理志》中记载邛都出铜,临邛出铁。西汉景帝时期临邛卓王孙“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临邛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可知,夜郎、靡莫、滇、邛都等族都属“椎髻之民”。这充分表明在先秦两汉时期巴蜀同滇池地区一直保持着经贸往来,巴蜀商贾的足迹早已遍布云南滇池地区。这些来自巴蜀的商贾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西段道路与滇西各地间进行经贸往来。

先秦两汉时期,川滇黔三地间的贸易往来随着各地间社会经济发展及物资的不断丰富而显得更加频繁。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所载:“南粤

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sup>[10]</sup>此段文献所载蜀贾人窃出市夜郎我们可知,先秦两汉时期四川特产枸酱,它已由当时的蜀商经牂牁江南下销往夜郎和南越等地。该风物远播南越之地的道路,历史上我们习惯称其为“牂牁道”。据古文献记载,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夜郎国当时并不为中原人所知,那更无法知道这条道路的存在。而蜀地通往夜郎的最为便捷的道路应该是当时的五尺道,即蜀中心腹地成都经乐山、宜宾、云南昭通入贵州威宁通夜郎腹地再转运南越之地。除枸酱在此道路沿线进行贸易外,其产于巴蜀、滇、夜郎等地的各种风物也可以经由此道路进行贸易,这一段道路正是南方丝绸之路东段。

食盐一直以来也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因此,食盐也就成为了人类聚落形成与不断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在人类早期的商品贸易中,除了各种农牧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外,食盐也对商品交换的发展具有神奇的驱动力。食盐因其易于溶解、不易保存的特点,因此不容易从考古遗迹中发现,但我们不能片面的忽略其在贸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国西南自古就盛产食盐,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地方均有盐井的发现,而从历史文献记载上看,中国西南道路沿线食盐贸易的记载也不计其数,文中摘取典型几例加以载述,《华阳国志·蜀志》载曰:“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亦八百人,而郯公从禽,巷无行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sup>[11]</sup>这段文字说明,秦并六国后,陆续有巨商从六国迁蜀滇之地,他们利用当地的资源,从事冶铁煮盐等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又如《汉书·货殖列传》中载:“程郑,山东迁徙也,亦冶铸,贾椎髻民,富埒卓氏。……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sup>[12]</sup>文字中记述可见在汉代居于临邛(今四川成都邛崃)的程、郑二氏作为川滇之地的富商大贾也从事着食盐的生产贸易活动。而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在汉代,川南的汉安县(今四川江安)

“汉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一郡沃土”,江阳县“有富世(今四川富顺)盐井”<sup>[13]</sup>。从上面几段文字的记载可知在先秦两汉时期,川滇等地已经有多地产盐,其多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沿线各地。

秦汉时期,随着西南道路网的不断拓展,西南地区的盐业也快速发展,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秦并巴蜀后,特在成都设盐铁市官。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全国设盐官凡37处,而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所设的盐官就有5处之多,它们分别是临邛(今成都邛崃)、南安(今四川乐山)、南广(今宜宾长宁)、连然(今安宁)、蜻蛉(今云南大姚)等川滇产盐地区。盐官的设置说明在这些地区已经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盐业贸易,而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上设置如此多的盐官,更说明在这条道路上盐业贸易的兴盛。

食盐贸易作为中国西南道路上较早的贸易活动之一,它与道路的开辟有着紧密关系。食盐贸易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川滇之地,其完全可能通过五尺道销往夜郎之地,甚至通过牂牁道远销南越地区。同时产于川滇之地的食盐完全可以通过南方丝绸之路销往境外缅甸、印度等地,实现中国西南与境外间的贸易往来。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大部为西南夷各部族居住地,这里存在着众多部族,其社会仍然处于农耕奴隶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因此区域间的贸易往来往往是以物物交换形式而存在。这种情况可从文献可知,《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言:“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犏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sup>[14]</sup>此句所指巴蜀商贾通过走私出关,以个体成员的身份,或单个或群体用丹沙、石、铜、铁、竹、木等蜀地出产的商品与西南夷的“邑君”、酋长进行物物交换,蜀贾从这些部族换回犏马、僰僮、髦牛等。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古蜀国与西南夷各部族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而中国西南各地间的贸易往来得以实现,其正得益于各地间存在

着较为通畅的道路。

### 三、西南地区道路与区域文化交流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多地已经出现了众多早期文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有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以滇文化为代表的云南地区早期文化,以夜郎文化为代表的贵州地区早期文化等多个文化。在这些文化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外来的文化因素也出现于本土文化中,西南地区早期道路的开通正有助于这些文化的相互传播,并促进区域文化发展。下文笔者将对其中一些出土的典型器物进行分析例证,来说明西南地区道路对区域文化交流所起到的作用。

随着近年来中国西南地区各地考古遗址的不断发现,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多地遗址中发现了众多非本地文化因素的器物。下文中以部分典型实例加以说明分析。

安宁河谷地区从古至今都是四川与云南之间的重要通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西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安宁河谷中发现有不少蜀式器物 and 巴蜀土坑墓,如越西县大屯乡华阳村发现的土坑墓葬群和巴蜀印章、铜蒜头壶、釜和兵器<sup>[15]</sup>。西昌马道点将台也发现了巴蜀土坑墓,这些土坑墓属于战国至秦代,应为蜀人的墓葬。从这里可以看出,蜀文化已经出现于该地区,同时也和当地文化间产生互动交流。这也是蜀文化经南方丝绸之路西线主道传播的路径,并进而将蜀文化经由此道路传播于滇文化区。

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出土铁器一百多件,江川李家山西汉墓出土铁器40多件<sup>[16]</sup>。而先秦至西汉前期滇池地区仍处于奴隶制水平,虽该区域已经进入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但还未进入铁器时代。这些遗址出现的铁器很可能是通过贸易而来,据有的考古学家考证认为,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来自四川<sup>[17]</sup>。来自四川地区的铁器工具正是通过巴蜀商人贸易获取,这些铁器也是西南中叶巴蜀铁器的典型

此处所指的西南夷,其范围包括云南滇池洱海地区的滇、靡莫、昆明、嵩等族,同时也包括云南东北五尺道沿线各部族,贵州夜郎、牂牁等部族,四川南部僰人等众多民族。这一区域为西南夷各部族生活之地,其也是先秦两汉时期西南道路沿线各部族。

代表,具有巴蜀铁器文化特点。

云南大理境内也出土有部分巴蜀式器物,如云南弥渡直力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大石墓中出土有环首直背削刀<sup>[16]</sup>。这种铜削刀为战国中晚期巴蜀墓葬中常见的陪葬器物,其很可能是直接从巴蜀地区输入的,而这种巴蜀兵器出现于云南大理大石墓中,说明这类兵器已经在此广泛运用,蜀文化也很可能对该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

滇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则为当地的青铜文化,从云南先秦两汉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遗物看,滇北一带的青铜文化与巴蜀文化显得更为紧密。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青铜戈上刻有一披发裸体联手人的形象,这同成都白马寺出土铜戈上人物形象完全相同<sup>[19]</sup>。从铜戈的式样看,石寨山的铜戈具有典型蜀式青铜戈的特征。从这些考古资料可以看出,蜀文化已经通过四川与云南间的道路传播至云南多地,并对滇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蜀文化对滇文化影响的传播路线很可能是从成都经牦牛道入四川汉源再经大渡河流域传至越西,再沿安宁河至西昌,经金沙江的支流沿线道路传播到云南滇池地区、大理等地,这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段主线的具体走向。

先秦两汉时期,除中国西南的滇文化与巴蜀文化出现广泛的文化交流外,同样地处中国西南的夜郎文化区也与巴蜀文化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贵州地区出土的大量兵器中可觅见巴蜀文化的踪迹。如贵州赫章可乐战国墓葬及威宁中水汉墓内出土的青铜剑<sup>[20]</sup>,其形制与古蜀柳叶形青铜剑极为相似,据段渝教授分析这种出土于贵州赫章和威宁的青铜剑则完全是对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改装。<sup>[21]</sup>除青铜剑外,在夜郎境内还发现几种铜器,从这些铜器中可窥见夜郎文化与巴蜀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影响的情况。如在贵州赫章可乐墓葬群中,发现了不少立耳铜釜<sup>[22]</sup>,这种铜釜的特点为:口沿之上立有一对对称的辫索纹半耳环。这与重庆巴县东笋坝、四川昭化宝轮院、犍为万年大队和五一大队等地出土的釜、甑等铜器上的辫索纹完全一致。另贵州威宁中水遗址出土的一种直援、无胡、两穿青铜戈<sup>[23]</sup>,这种青铜戈的援身中线起脊,后有一圆孔,圆孔四周和内后饰

有鬻鬻纹各一组,这种戈与四川彭县出土的晚期蜀式戈形制较为接近<sup>[24]</sup>。另在贵州兴义市土产公司仓库出土一个较小的对称刃口钺,其形制除釜部外,均与重庆巴县冬笋坝77号墓所出钺大同小异<sup>[25]</sup>。

前文中所述,《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汉代蜀郡巨商卓王孙、程郑即“铁山鼓铸”,“贾椎髻之民”,文中所提及的“椎髻之民”就是夜郎、靡莫、邛都等民族。这些来自于夜郎、邛都等地的僮奴成为了蜀郡巨商家中的劳力,并从事铁器工具、手工业制品等的生产。产于蜀郡的铁器同时也销往夜郎之地,这可以从贵州地区近年来考古发掘器物中发现。如贵州赫章乐可水营生产队所发掘的数十座汉墓中,一些小型墓葬中除发现有铁质兵器外,还出土了大量铁器生产工具<sup>[26]</sup>。这些铁器生产工具与当时蜀郡的铁器生产工具在形制上并无区别,其很可能随蜀商贾贸易至此供夜郎居民所使用。除青铜兵器、铁制生产工具外,来自巴国地区具有典型巴文化的生活配饰用品也出现于夜郎之地,最为典型的配饰器物是出土于贵州威宁中水墓群中的一件卧虎形铜扣饰<sup>[27]</sup>。巴人与虎的传说关系密切,这种虎形扣饰是否与巴人有关,是否受巴文化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

从以上考古发掘材料可看出,先秦两汉时期,由于夜郎与巴蜀毗邻,这一时期贵州与川渝之间经济文化交往不甚密切,其经贸文化交流的路径极有可能通过沟通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的五尺道和贵州境内的牦牛道得以实现。

## 结 语

道路是地区经贸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重要前提,经贸文化因道路而繁荣。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各地间就已经有多条道路将西南各地连接在一起,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主干道路则是南方丝绸之路,其西段牦牛道将四川与云南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东段的五尺道和牦牛道更是将川渝、云南、贵州等西南各地紧密相连。随着中国西南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它们也成为中国西南各地间经贸交流的纽带,同时也成为促进中国西南各文化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

中国西南道路——南方丝绸之路不仅在先秦两汉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推动下,其地位和作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重新认识和发掘中国西南道

路——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过程中,重构“南方丝绸之路”国际交通线,必将对促进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区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7] [8] [14]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73.2993,3261.
- [2] 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M].中华书局,1962.27.
- [3] 段渝.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 [4] 颜信.先秦两汉时期的五尺道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4,(6).
- [5]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四·山剑滇黔区[M].台湾商务书馆,1986.1286-1293.
- [6] 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25.
- [9] [10] [12] 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73.1645,3839,3690.
- [11] [13]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8,180.
- [14]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73.2993.
- [15] 凉山州博物馆,越西县文化馆.四川越西华阳村发现蜀文化[A].文物资料丛刊(7)[C].文物出版社,1983.
- [16]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R].考古,1959,(9);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R].考古,1963,(9);云南省博物馆.江川李家山古墓葬发掘报告[R].考古学报,1975,(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管会,晋宁县文管所.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清理发掘简报[R].文物,1998,(6).
- [17] 童恩正.对云南冶铁业产生时代的几点意见[J].考古,1964,(4).
- [18] 张新宁.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J].文物,1986,(7).
- [19] 吴怡.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关系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C].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
- [20]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J].考古学报,1977,(2).
- [22]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R].考古学报.1986,(2).
- [23]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R].考古学报,1981,(2).
- [24] 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J].文物,1980,(12).
- [25] 前西南博物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和汉墓清理简报[R].考古通讯,1958,(1).
- [26]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R].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C].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 [27]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第二次发掘[R].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C].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邹一清)